

本书系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土耳其历史和政治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英国的 土耳其形象研究 (1800—1853)

贺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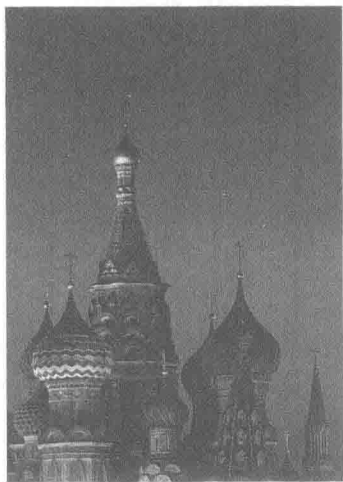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十九世纪英国文献中
土耳其形象的百年变迁”(15YJC77001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6CBZ012) 资助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英国的 土耳其形象研究 (1800—1853)

贺敏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对 19 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土耳其形象及其成因进行了论述。本书认为这一时期英国的土耳其形象话语的表述裹挟了政治、经济、宗教和外交等因素,以大卫·厄克特为典型代表的英国激进主义者建构了一个政治上和谐平等、经济上自由开放、宗教上世俗仁爱、外交上被动无奈的多元土耳其形象,由此构成了一种“反东方学”的形象话语。故而,新视角之下人格化的土耳其形象呈现出与历史上既定形象的差异,继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土耳其形象欧洲性争论。实际上,多元化土耳其形象的复杂性与土耳其的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

本书可供世界史、国际关系等专业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的土耳其形象研究: 1800—1853 / 贺敏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03-054597-8

I . ① 英 … II . ① 贺 … III . ① 土耳其—历史—研究—1800—1853 IV . ① K37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460 号

责任编辑: 任晓刚 / 责任校对: 韩 杨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1/2

字数: 280 000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近代早中期欧洲镜像中的土耳其	14
第一节 15—18 世纪欧洲视域下的土耳其形象	15
一、15—17 世纪多元化的土耳其形象	16
二、18 世纪单一化的土耳其形象	21
第二节 欧洲对土耳其形象认知多元与嬗变的根源	24
一、宗教因素	25
二、文化因素	26
三、权力因素	26
第三节 英国与土耳其的早期交往	28
一、贸易交流	28
二、文化交流	30
小结	34
第二章 19 世纪上半期欧洲国际关系对英国和土耳其的影响	36
第一节 纳瓦里诺事件	37
一、纳瓦里诺事件始末	38

二、纳瓦里诺事件中的欧洲国际关系	39
三、纳瓦里诺事件的影响	43
第二节 1833 年危机	45
一、从旁观到关切：英国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	45
二、从瓜分到“保护”：俄国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	48
三、1833 年危机始末及影响	50
小结	53
第三章 土耳其形象在英国的代表性认知：以大卫·厄克特 为例	54
第一节 大卫·厄克特生平及其政治主张	55
一、大卫·厄克特的早期生活	55
二、从亲希腊到亲土耳其的嬗变：大卫·厄克特的东方经历 ..	57
三、亲土反俄——大卫·厄克特的双轨主张	61
四、大卫·厄克特的著作及其思想扼要	65
第二节 土耳其的政治形象	70
一、地方政府制度	70
二、直接纳税制度	73
三、对土耳其政治形象的评价	81
第三节 土耳其的经济形象	83
一、土耳其的地缘重要性	84
二、英国的贸易处境	87
三、自由贸易	92
四、对土耳其经济形象的评价	97
第四节 土耳其的宗教形象	102
一、平等视角：宽容与仁爱的伊斯兰教	102
二、世俗化视角：兼顾政治与文化的伊斯兰教	104
三、对土耳其宗教形象的评价	107

第五节 土耳其的外交形象	109
一、与欧洲“互动”外交的窘境	109
二、与英国“保护”框架下外交认识上的差异	112
三、对土耳其外交形象的评价	115
小结	117
第四章 人格化的土耳其形象及争论	118
第一节 苏丹马赫穆德二世形象的争论	118
一、东方专制君主	119
二、改革家	121
三、对苏丹马赫穆德二世形象的评价	124
第二节 土耳其和希腊形象的争论	126
一、土耳其人与希腊人的残忍人性之辨	127
二、希腊文明的救赎? 抑或堕落?	128
三、纳瓦里诺事件的上议院之争	129
四、对土耳其和希腊形象争论的评价	130
第三节 土耳其形象的欧洲性的争论	133
小结	137
结语	139
参考文献	154
附录	167
后记	172

绪 论

西方赠予了东方启蒙的恩惠，愿它在思想方面也如此。

——《土耳其通报》(*Moniteur Ottoman*)

如果我不是加尔文主义者，那我一定是穆斯林。

——大卫·厄克特 (David Urquhart)

19 世纪沉浮于当时欧洲权力政治之中的奥斯曼帝国 (领土中心区域为今土耳其)，已不再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的“欧洲恐惧之源”，它与西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颠倒，成为欧洲大国觊觎瓜分的对象，由此成了“一个无穷尽困难之源”——“东方问题”的核心国家。

19 世纪初，英国最初对近东问题采取不干涉的观望态度，然而希腊独立革命不仅使英国最终卷入了近东问题，而且使其在 1827 年的纳瓦里诺事件中与俄国、法国联合歼灭了二百多年的老盟友——土耳其的海军舰队。1833 年危机使俄国在海峡地区取得绝对优势，“尴尬”处境中的英国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坚决维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与独立；然而 19 世纪 40 年代近东危机后英国和俄国就土耳其的瓜分问题却预先达成谅解。但是英国与俄国在近东的贸易竞争最终使二者劳燕分飞，1849 年英国与土耳其的防御性盟约使英国在 1838 年争取到对土耳其贸易的主导权外，再次夺得了对近东政治方面的领导权，英国和土耳其就此“同舟共济”，但却为 19 世纪 50 年代打破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和平——“欧洲协调”埋下了伏笔。



由此，新兴资本主义强国英国与日薄西山的土耳其这两个异若霄壤的国家势必在彼此颠簸不定的关系中发生碰撞，与此同时，相互之间的交流俱存。故而，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工业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代表的英国如何审视与考量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前工业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代表的土耳其值得我们关注。通过研究基于 19 世纪的英国外交档案、已出版的原始文献、报纸、研究专著和评论等对土耳其形象的多元认知，有助于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学界的相关研究。首先，我们能够对 19 世纪初叶到中叶前期英国的多元土耳其形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其复杂形象建构的深层次原因及影响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其次，建构另一个民族的形象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由此，本书有助于深化对 19 世纪英国社会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英国史的另一个视角。最后，形象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界的探索尚不充分，对异域民族形象建构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实际应用价值方面，中国与土耳其位于历史上最早的东西国际交通线——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昔日盛享辉煌的中国和土耳其在历史的洪流中一度沦落为远东与近东两大领土日蹙弱国，相似之处甚多。通过研究历史上作为“领头羊”的英国对土耳其的审视判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整体上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强国对积弱积贫之国的考量标准及其发生嬗变的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英国在应对异质文明时所展示出的娴熟外交技巧，为中国处理与大国、小国的双边、多边关系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就 Turkey 和 The Ottoman Empire 的指称问题而言，我们一般将前者译为“土耳其”，将后者译为“奥斯曼帝国”。对此二者的指称及使用在 1923 年之后应该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在奥斯曼帝国存在的 600 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指称在帝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人经常把奥斯曼帝国称为“土耳其(Turkey)”，其人民为“土耳其人(Turks)”；但是土耳其人自己却喜欢将他们的帝国称为“高贵的奥斯曼帝国”，它的统治阶层为“奥斯曼人”（即便这些官员不是皇朝成员）。^①由此凸显出土耳

^① William Hal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1774-2000*,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15.

其人民和西方人对土耳其及其人民在认识方面的差异及认可方面的鸿沟。在西方看来,“土耳其”就是他们对土耳其的称呼,并且这一称呼还是有史可寻的。据记载,1190年的一份巴巴罗萨所谓“十字军”的大事记中首次将土耳其人所征服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称作土耳其。^①到13世纪,科尼亚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用“土耳其人”这一名称专指土库曼民族^②,土库曼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迁徙。这样的称呼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国家是受到神灵保护的“伊斯兰园地”。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伯纳德·刘易斯将这样的名称归为初生的民族意识感,并且认为是宗教的颀颀掩盖了它的存在,甚至导致了人们对它的忘却。^③事实上,作为政治或者地理实体的“土耳其”这个词语在土耳其语或者其境内人民所讲的其他语言中并不存在。^④鉴于本书研究的视角是英国的视角,故书中采用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称谓——土耳其。但涉及直接引用及具体情况,则视二者为可交替使用。

“形象”是指行为体(“民族”或者“国家”)的整个认知、情感和评价性的体系,或者是它对自己和世界的一种内在的看法。它会受到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可用一系列的“相关变量”来描述:战争或和平;敌意或友好的程度;盟友或敌人……^⑤在行文中,笔者将土耳其形象定位为一种可以映射出具有同质性的“想象共同体”。换言之,在英国对土耳其集体民族形象的建构和表述中蕴含着土耳其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等多层次的形象概念。

在这个简短的关于形象的界定中至少蕴涵三个特定的意义:其一,形

① Claude Cahen. Le Problème Ethnique en Anatoli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i, 1954, p. 360. 转引自(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6页。

② G. E. von Grunebaum. *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 330.

③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8页。

④ Metin Kunt. *State and Sultan up to the Age of Süleyman: Frontier Principality to World Empire*, In Metin Kunt, Christine Woodhead.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and His Age*,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5, p. 4.

⑤ K.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pp. 120-131; K. E. Boulding.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象是一种情感的认知判断，因此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可塑性。其二，形象的建构是一种心理活动，这就意味着它与现实的映照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其三，形象是民族或者国家构建自我和“他者”的一种映射，与此同时，它会受到国际体系行为体之间或和衷共济或拔刀相向的关系的影响。民族形象因其成员的复杂性而显示出相对应的庞杂，如果我们用简约的方式来区别的话，那么有两大类型的民族成员：其一是精英人物。其二是普通百姓。前者主要是指一小群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做出一些构成国际关系的重大决策，如战争或者和平、签订或者取消和约、进攻或者撤退、结盟或者敌对等。后者几乎不参与这些决策，但却深受其影响。^①某一民族形象更多的指的是集体民族，而民族却是由历史学家创造而成的，由此，民族形象可以追溯至久远的历史记忆，并且有延续至未来的态势。

本书主要从四个层面来展开。首先，笔者考察了近代早中期欧洲^②的土耳其形象话语的建构及其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早期英国与土耳其之间并不存在历史疆界（principle of historic frontier）^③的分歧。14世纪以降，土耳其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中东及巴尔干等地区，但是其征服的步伐始终没有踏上英国的领土，故此，此时期英国的土耳其形象更多的是在欧洲的视角之下得以体现。其次，笔者认为英国和土耳其之间存在经济疆界（principle of historic frontier，肇始于16世纪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以及军略疆界（principle of strategic frontier）的利益纠葛（19世纪30—50年代英国在此方面的考虑在其近东外交决策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① K.E.Boulding. National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p. 121. 另外，肯尼思·博尔丁（K.E.Boulding）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和平主义者、诗人、宗教神秘主义者、贵格会教徒、系统论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著有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② 本书的研究领域是欧洲社会文化史，在提及欧洲及欧洲文化概念时，均参考荷兰学者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概念。在他看来，欧洲应该包括西欧、东欧和中欧，但是最能代表欧洲特性的是西欧。东欧（包括中欧）与西欧的分立已经使人们很难把它们联系成一个整体。参见（荷）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赵复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③ 寇生（Lord Curzon，翟楚原文中使用的是此译名，现在我们习惯上译为寇松）认为19世纪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利益和疆界原则的矛盾所致。翟楚先生认为关于疆界问题存在三种原则：历史疆界、经济疆界及军略疆界。参见翟楚：《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7—8页。

故而考察了英国与土耳其的文化往来、外交关系以及它们对 19 世纪上半期英国与土耳其的影响。再次，在对英国的土耳其形象的整体考察的基础上，撷取 19 世纪 30—50 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大卫·厄克特及其拥护者塑造的土耳其形象来阐释此时期英国对土耳其形象的多元认知。最后，在精英人物即 19 世纪土耳其西化的改革者——苏丹马赫穆德二世层面上考察了英国对人格化土耳其形象的争论。此外，将这种争论的视野拓展到 19 世纪在土耳其治下首掀民族解放运动的希腊独立革命，考察英国对土耳其及希腊形象的争论。同时，探讨了土耳其形象欧洲性的争论。

遵循这样一个结构，本书围绕英国的土耳其形象的建构及掣肘这种形象话语的因素展开讨论与诠释。在此基础上，本书得出结论：英国所建构的 19 世纪的土耳其形象话语的表述裹挟了政治、经济、宗教和外交等因素。换言之，此形象话语的表述是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博弈和较量。因而英国的土耳其形象是一种复杂多元化的立体形象，其复杂性与英国和土耳其的权力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形象话语与权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即强势话语和弱势话语并不一定与强势权力和弱势权力相呼应。

1999 年在《纽约时报杂志》组织的“千年出版物”特别系列活动的闭幕式上，被提名布克奖^①的小说作家 A.S.拜厄特（A.S.Byatt）就“最佳故事”（Best Story Ever Told）推荐了她自己的特殊候选对象：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在《一千零一夜》中所讲述的故事。无独有偶，早在 150 年前散文家艾略特·沃伯顿（Eliot Warburton）也有过相同的荐举。《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于 1701 年被法国东方学家、考古学家安东尼·加兰德（Antoine Galland）译为法语版本，随后又被译为不同的欧洲语言版本，由此，欧洲人开始熟知舍赫拉查德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以及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至 2005 年 10 月，英国诺丁汉剧院还上演了 9 位作家合作的《今日之一千零一夜》，讲述的仍然是西方欧洲与东方阿拉伯在现代的交流。

^① 此处是美国的布克奖，即 The Booker Prize。英国的布克奖以其赞助商的名字命名，从 1969 年开始按照年度颁发，被公认为是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时至 2014 年，英国的布克奖才开始接纳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

毋庸置疑,“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史、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①,它经常让西方的文明世界大发思古幽情。东方除了展现出迥异于西方的异国情调之外,还给予了西方来访者们一种远离工业化社会的恬静与安宁。“成群结队身着色彩斑斓服饰的马倌扬着马鞭,狂野地吆喝着,他们在高地或连绵起伏的山脉间疾驰。在被露珠浸湿的清晨匆忙上路或者在被晚霞映红的傍晚急速‘回家’”^②。这种对东方的浪漫化认识无疑影响了诸多西方人,东方的古老、关于东方的诗歌都会激发他们对东方的憧憬。也许他们在少年时期怀揣的梦想就曾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启迪。尽管东方的旅行会带来鞍马劳顿的困乏,但是与静谧的大自然之间平静的交流却能让旅行者对人类和世界进行安静的观察,由此形成沉思的心态,从而获得思想和心灵上的清醒。^③更为重要的是,异若霄壤的东方世界给西方的旅行者们提供了了解他们现实世界的新视角,他们在东方的制度和风俗中找到了西方文明在前进过程中遗失的一些特点,“欧洲复兴缺乏活力的亚洲的政治主题有了文学和艺术上的对应,即国外简单的世界可能有助于振兴日趋灰暗的欧洲”^④。

19世纪30年代,另一位颇有影响的英国人也对东方表达了类似的好感。他就是被东方人亲切地称为“达乌德省督”(Daoud Bey)的大卫·厄克特——《土耳其及其资源》(*Turkey and Its Resources*)、《英国、法国、俄国及土耳其》(*England, France, Russia, and Turkey*)、《东方精神》(*The Spirit of the East*)的作者,《档案》(*The Portfolio*)、《自由报》(*Free Press*)的主编,外事委员会的创始者。他曾为英国的多家报刊撰稿,其观点得到了多家报刊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英国与外国评论》(*British and Foreign Review*)、《布莱克伍德

①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页。

② Davi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London: James Moyes, 1838, Introduction, p. xvi.

③ Davi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London: James Moyes, 1838, p. 12.

④ Philip Darby, *Three Facts of Imperialism, Britai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Asia and Africa 187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1.

爱丁堡期刊》(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①、《泰晤士报》(The Times)、《晨报纪事》(Morning Chronicle)等的刊载与拥护。他在19世纪30—60年代对土耳其表现出极大的好感,年仅25岁即成为希腊、土耳其和英国最著名的公共人物。^②在其毕生的事业历程中,他矢志不渝地追求两个目标:其一,摧毁当时盛行的秘密外交。其二,呼吁承认国际法,并在公正和诚实的基础上重建国际关系。在大卫·厄克特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哥特式的西方与土耳其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对比之下,土耳其的保守要优于欧洲的进步,因为前者保存了古老的制度。他证明西方人眼中的落后实质上就是更加文明与讲究礼仪的过去,而这一切均可以在土耳其的制度中找到。同时,土耳其展示出非同一般的活力,可以成为英国产品的出口地,并且能为英国的制造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此外,土耳其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抵制俄国在近东和亚洲推进的堡垒。由此,大卫·厄克特不遗余力地推动土耳其和英国在政治和贸易方面的交流。

爱德华·W.萨义德批评东方学家对东方没有同情之心,没有彰显出普遍的人性和怜悯之情。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卫·厄克特解构了东方学家的范式,表现出反东方学家的一面。“英国人因为土耳其人没有画像而认为他没有品位;土耳其人因为英国人漠视自然而认为他缺乏情感。……欧洲人认为土耳其人自大、忧郁;土耳其人认为欧洲人轻率、庸俗。由此可以想象在二者之间建立的交流是多么‘有趣’‘友好’‘和谐’!”^③从爱德华·W.萨义德的角度来看,西方需要东方来突显其优越性:“东方……以它相异的形象、思想、个性、经历帮助界定了欧洲(或西方)的形象。”^④但从大卫·厄克特的视角来判断,西方与东方却互为映照对方的“镜子”,西方也以其相异的精神、政治和经济帮助界定了土耳其(东方)的形象。事实上,大

① 我国著名史学家阎照祥在其《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一文中将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翻译为《黑森林爱丁堡期刊》,笔者以为此译法不妥。因为此期刊是由一位名叫Blackwood的出版商于1817年创立发行的,目的是与辉格派的《爱丁堡评论》及《绅士期刊》(Gentlemen's Magazine)相竞争,故应按照人名音译的习惯来翻译为妥。参见阎照祥:《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第68页。

② Challes King. Imagining Circassia: David Urquhart and the Making of North Caucasus Nationalism, The Russian Review, Vol. 66, No. 2, 2007, p. 247.

③ Davi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London: James Moyes, 1838, p. 43.

④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45.

卫·厄克特走得更远，在他眼里，“我们的时代已经失去了以前时代存在过的但不能用话语记录的最细微的制度。而在东方，这些古老时代的制度仍然生动地存在着”^①。现代欧洲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遗失了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弥足珍贵的“古老制度”，而处于封建时代的前工业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恰好能弥补这一损失。

为实现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有效交流，大卫·厄克特在政治事业和公共事业领域积极奔波，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成立外事委员会来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他的著作《英国、法国、俄国及土耳其》引发了轰动的效应，出版过 5 次。他对土耳其所持的观点犹如一股清流，影响了人们对英国外交和贸易政策的看法，公众普遍对土耳其持支持的态度。《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期刊》声称伦敦及一些地方的报刊对“东方问题”秉持一种“全民基调”。^②

大卫·厄克特并不是唯一对土耳其持有乐观看法的人，如上所述，英国的诸多报刊都刊载了大卫·厄克特的观点，从而在广大范围上影响到很大数量的读者。除此之外，旅行者、政治家也致力于构建美好的土耳其形象。例如，大卫·厄克特的朋友大卫·罗斯（David Ross）发表了《欧洲报刊论东方问题》（*Opinions of the European Pres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一书，对大卫·厄克特所秉持的观点进行了出色的回应，作者开篇就明确声明写书的本意就是揭露在欧洲盛行的对土耳其的错误观点，尤其是欧洲报刊秉持和认可的大众观点。^③

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看来，19 世纪是资产阶级时代，“它的关键词是：声势浩大、启蒙、沉着自信、自鸣得意”^④。显然，这是针对文明欧洲而言的。英国地理学家彼得·泰勒认为：“科学的逐步发展最终确定了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权，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文明……正是作为‘西方’或者‘现代’文明的欧洲在枪支的数量以及生产方面超越了所有的参与者……

① Davi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London: James Moyes, 1838, p. 11.

②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XXXIX, 1836, pp. 145-155.

③ David Ross. *Opinions of the European Pres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London: James Ridgway & Sons, 1836, p. iiv.

④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Abacus, 1975, p. 16.

现代欧洲以不言而喻的优越性而至巅峰。”^①相比之下，土耳其已然在“文明的进程”中落后，是“不变的东方”的典型代表。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讲，要想维持“完整”与“独立”唯有复兴一条路。这就要求其向“进步”的欧洲学习，模仿“文明”的欧洲。显然，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②并不赞成这样的主张，在她最后一封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信件中，她写道：“大人，由此你们可以明白，这些人（土耳其人——笔者注）并非如我们所表述的那般不文雅。毋庸置疑，他们对华丽的理解和我们的品位不一样，或者比我们更好。我认为他们对生命有着正确的领悟，并且使音乐、花园、葡萄酒和精致的食物充满了生命力，而我们却用我们永不能达到的政治阴谋、科学等来使人受折磨，就算我们做到了，我们也永远不能说服人们将这样的价值观奉为真理……我宁愿做一名无知但富裕的埃芬迪，而不是知识渊博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③对于蒙塔古夫人这种感性的宣言，大卫·厄克特却给予了毫无保留的肯定与赞美，他认为蒙塔古夫人“准确观察并如实描述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特征，是唯一一个做出公正判断，并在那里发挥了影响力且获得体谅的人”^④。

当时普遍为英国人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只有经过外部的推动，东方（土耳其）才有可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大卫·厄克特却并不赞成土耳其对欧洲盲目模仿。在他看来，欧洲，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工业文明的英国虽然在物质方面充裕，但是在精神方面却有明显的欠缺。对于土耳其而言，“过度模仿西方的礼仪、偏见和制度是令人痛苦的”^⑤。面对百弊丛生的现代文明欧洲，大卫·厄克特的解决办法在当时的社会里显得“离经叛道”，他要以东方的办法来解决西方的问题。因为东方尤其是土耳其保留了

① P.J.Taylor.Embedded Stat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Opening up to New Spac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Vol.28,No.11,1996,pp.1917-1928.

② 蒙塔古夫人于1717年2月至1718年7月伴随任大使的丈夫在伊斯坦布尔逗留，她以书信的形式记录了她对土耳其的印象，在18世纪这些书信多次出版发行，但一般认为版本比较粗糙，直至1965年具有学术性的版本得以出版。参见Robert Halsband.*The Complete Letters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708-1720*,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

③ Robert Halsband.*The Complete Letters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708-1720*,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415.

④ David Urquhart.*The Spirit of the East*,London:James Moyes,1838,Introduction,p.xxx.

⑤ David Urquhart.*The Spirit of the East*,London:James Moyes,1838,Introduction,p.xxxi.

历史上伟大帝国的共有制度，这些伟大帝国中也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历史的概念使政治经济学家，包括他们的批评家马克思，对“文明”（被定义为是技术的优越和复杂的劳动分工）也持有保留的态度。他们将“文明”和“野蛮”作对比后，认为“野蛮”占了上风。换言之，文明的进程伴随着愚蠢与堕落^①，而“野蛮”却蕴含进步与文明。故此有了“野蛮”东方成了“文明”欧洲模仿的榜样的设想和观点。

尽管大卫·厄克特尖刻地批判西方列强对东方事务的干涉，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建构英国是世界保护者的形象。在外交上，他声称英国对土耳其的兴趣是出于“博爱”，这与其他欧洲大国对土耳其“包藏祸心”的动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②在经济上，大卫·厄克特强调英国对土耳其的贸易“并不是机器的奇迹，也不是国内财富的积累；而是对英国的伟大品质，或者她对上百万与她没有任何看得见关系的人们命运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公正的观点”^③。厄克特有意建构的英国“恩抚主义”的慈爱形象由此跃然纸上。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保护那些易受侵害的非欧洲民族，他们将之视为“白人的责任”。并且他们喜欢给自己自封的“开化世界”的使命附加上道德的粉饰。格雷伯爵曾经提醒人们不应忘记，一个国家的权力不仅在于它所拥有的物质力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舆论和道德影响力。^④在大卫·厄克特眼里，英国凭其高贵的品质来行使对世界的责任。“英国作为正义的执行人、国际公法的维护者，应该挺身而出。”^⑤但是令大卫·厄克特感到失望的是英国的道德与其在世界体系的重要性不成比例。在他看来，欧洲政府“规章制度丛生、部门林立、细节冗繁”，故此“思想的混乱”导致“行动的错误”。接踵而至的是“权力的集权化”，从而使地方政府衰亡，曾经让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有机联系“不

① 约翰·拉斯金认为世界应该走一条新的道路，尽管仍然看不到走出文明愚蠢与堕落的出路。参见 John Ruskin. *The Nature of Gothic*,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2, Preface, p. vii.

② David Urquhart.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33, Advertisement, p. vi.

③ David Urquhart.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33, p. 142.

④ （英）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⑤ Gertrude Robinson. *David Urquhart: Some Chapters in the Life of Victorian Knight Errant of Justice and Libert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70, p. 165.

再作为道德实体来行事”。正是出于对现代欧洲/英国在道德层次上的堕落考量，大卫·厄克特对土耳其形象的表述表现出对其同胞的讽刺和背叛。在后者看来，土耳其的改革和现代化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战略不可分割。对于西方而言，东方能选择的最佳道路就是采纳西方的文明方式，即西方文明框架之下的东方复兴。无疑，这样的复兴势必会打上西方帝国主义的烙印。而大卫·厄克特在其中扮演的就是反帝国主义、反东方学的角色。他的“异端”主张“东方的方法可以用之于西方”^①触发了土耳其官员和人民的共鸣，但却让维多利亚时期的外交圈哗然。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土耳其美好形象的勾勒与英国对俄国的恐惧相互交织在一起。19世纪初，欧洲视俄国为拯救者，因为俄国将其从拿破仑的专制下解放了出来。当时的俄国因对法国和波兰都采取了温和的政策而受到了欧洲国家的尊敬。英国的辉格党承袭了18世纪90年代的传统，欲与俄国结成合作关系。但好景不长，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乌云密布，尤其是在1833年的《温加尔·伊斯凯莱西条约》签订后，两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此时俄国成为欧洲的反势力、波兰的压迫者、专制统治的堡垒。英国的报刊于1835年表露出反对俄国的论调，到1836年这种论调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历史学家J.H.格里森（J.H.Gleason）认为当时的英国政治家对俄国的“邪恶”有“广泛接受的定势”^②，“他们在普及仇恨俄国的手段以及俄国垂涎印度的观点，不管有多么的荒诞，都激起了人民无知的恐惧”^③。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彻底的恐俄者”^④大卫·厄克特坚定地认为俄国势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威慑到英国的利益，故而以“偏执的精明和大量的专业知识”^⑤来开展他反俄亲土的活动。在众多恐俄大军

① Gertrude Robinson. *David Urquhart: Some Chapters in the Life of Victorian Knight Errant of Justice and Libert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70, p. 73.

② John Howes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20.

③ John Howes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86.

④ Samuel H. Baron. Marx and Herberstein: Notes on a Possible Affinity,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19, 1995, p. 73.

⑤ Samuel H. Baron. Marx and Herberstein: Notes on a Possible Affinity,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19, 1995, p. 73.